

“毗陵四家”与《文统》编纂

陈圣宇

(南京审计学院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江苏 南京 211815)

摘要:清初“毗陵四家”陈玉璠、董以宁、邹祗谟、龚百药致力于古文创作,在当时文坛较有影响。“毗陵四家”为了贯彻其古文理念,集体从事《文统》编纂的工作。《文统》以文章选本形式,贯彻了清初理学重臣魏裔介的道统观念,与魏氏《圣学知统录》、《圣学知统翼录》等相为表里,也与康熙亲政后追求“道统”与“治统”合一的正统化主张遥相呼应。

关键词:毗陵四家;魏裔介;《文统》;选本编纂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750(2011)02-0103-07 收稿日期:2010-12-16

作者简介:陈圣宇(1974—),男,江苏启东人,南京审计学院国际文化交流讲师,博士,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文学和文献。

基金项目:南京审计学院校级课题(NSK2008/C01)

康熙初年,以陈玉璠为中心的“毗陵四家”通过编选古文选本及与当时士人频繁探讨古文理论,在文坛上形成较大的影响。“毗陵四家”指陈玉璠、董以宁、邹祗谟、龚百药,四人都是武进人(古称毗陵),加之四人志向相同,励志为古文辞,并曾合刻文集,因此时人习称为“毗陵四家”。邹祗谟、龚百药文集现已不存,本文以董以宁、陈玉璠为代表,阐述四家的一些代表性古文观点,并探析四家参与编撰的《文统》与清初统治者“治统”、“道统”理论的关系。

一、董以宁的古文批评观点

董以宁只活了短短41年,但其一生治学志向变化甚大,陈玉璠曾说起,“予自总角与先生定交,见先生初喜为诗词,为排偶之作,越数年摈去排偶,一意于诗。越数年则并诗摈去之,专为史汉唐宋大家之文,尤留意天文、历象、乐律、方輿之学,故为文多所发明。越数年则一概摈去,而专事于穷经”^{[1]382}。其最终专事“穷经”的志趣,反映了“毗陵四家”的共同的古文理论倾向,此点后尤被陈玉璠发挥和完善。

虽然董以宁文章成就并不高,如邓之诚先生即认为“(董)以宁才大如海,著意为文,甚有笔

舌,誉者以为可与侯方域并步,则非公论”^[2],但他的文章理论具有一些可取之处,且可折射出“毗陵四家”共有的文学观点。他在《周栎园文集序》中对“规摹左国史汉”和“规摹八家”者都表示了不满,重点抨击了后者:“乃今人不揣,顾欲以向之规摹左国史汉者,转而规摹八家。不知规摹之病,在于貌似,而其实则如仲尼、阳货之迥乎不同。其规摹八家与规摹左国史汉,相去固不能以寸也,况色或犹可借,而气与力更难为借也,今之规摹八家者,并欲取其气与力而亦假之。”他认为文章之道应该如此:“文章之道始患其不洁与浮,而终患其不化。泛蔓之与粉饰,同一不洁也,同一浮也。必读书多而养之既久,渐渍充足于中,则其发为文也,无支言,无伪词,而自有不可掩之光华,令人矜贵。即极其平澹拙朴,无往不形而气厚力大,运之在我,更能神明变化于古人之法则,出于左国史汉八家,而脱换于左国史汉八家之外,以为吾所自有之文,乃真可以谓之文。”^{[3]413-414}

董以宁指斥“不洁”、“浮”、“不化”为文章的弊端,认为它的具体表现为“泛蔓”与“粉饰”。他最反对当时流行的“规摹左国史汉八家”,认为他们食古不化。为避免这一弊端,他认为作者必须具备深厚的学养,更要讲求文章之技巧,“神明变

化于古人之法则”，才能脱换出“吾所自有之文”。这是董以宁的心得体会。宋莘点评道：“篇中论文，直从自家得力处指点示人，非徒为栢园序也。”董以宁以这样的观点衡量同时代的古文家，他在《黄庭表文集序》中批评侯方域：“余见其纵笔千言，多在酒酣乐作之顷，而无所待乎深思，其才与气可谓之雄矣。但出之甚易，而发之无余。其病也每伤于露，而爱憎所在，又以意造事，而多失之诬。设天假之年，稍稍根抵六经，敛才息气，以归之于沉厚，则庶几有载道之文，而惜乎其不永也。”^{[3]418}

董以宁文中也对王猷定古文创作进行了批评：“王于一年六十余，老矣。其文正而不诡，密而不漏，切实而不浮，遂足以高自标置，而人亦称之。但其病为璞、为庸，数篇之后，意调略同，则又为隘。波澜未见，而急欲其老成，声光未吐，而遽求其淡穆，譬如不花而实，吾未见其可也夫。”^{[3]418}他指出，王猷定的学养不足又“急欲其老成”，其文章弊病在于琐碎平庸、意调重复、眼界狭小。他又敢于批评当时文坛大家钱谦益：“虞山钱氏之为文者乎，在先朝之时，深得于读书之功，博而能通，碑版大文尤为精采照耀。其气之厚、力之大，则并且过于朝宗，乃名望既隆，视天下为无与敌。至晚年，于是非所系之处，必为遁辞，而且秽杂不经，全无检束，遂觉年寿之永，其足累虞山者反多。此惟其自信之过，以为境之遽尽于斯，故垂成之际，懈气乘之也。”^{[3]419}董以宁文中指出钱氏于民族是非大义之处常为自己的贰臣行为开脱，认为钱氏晚年作品“秽杂不经，全无检束”乃是过于自负的缘故。

董以宁本人文学创作水平虽然不高，但他的古文批评为清初古文理论的完善和古文在江南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因此宋莘《董文友全集序》认为，“朝宗古文独为之举世不为之时，以创于北，而其后古学大兴于南方，则自文友开其先”^{[3]402}。

二、陈玉璫的古文批评观点

陈玉璫为“毗陵四家”的核心人物，其著作甚多。挚友邵长蘅称“椒峰著《学文堂集》八十卷，久行于世，余尝序之《史论》百余卷，今方板行，又《经解》若干卷，未卒业云”^[4]，还说“椒峰集最富，多至二百余卷”^[5]。由此看来，《四库全书》著录

的《学文堂集》恐非全本。

陈玉璫虽然著作甚富，但后世对他的作品评价却并不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虽赞同陈玉璫为“苦学之士”，但指责其“贪多务博”，对其诗文评价亦不高：“然大致逶迤平衍，学宋格^①而未成，诗则更非所长矣。”^[6]由此可见，四库馆臣大致认为其文章质实而纤弱，无浩大雄健之气势。

但后世方家也有人有不同看法，如著名历史学家张舜徽先生称赞陈玉璫“天资英朗，而益以苦学之功，故所造卓尔，在清初诸文家中，自是出类之选”。他还驳斥四库馆臣的评价说：“此则不公之评也。以余观玉璫绩学之功，论学之识，自在并世诸文家之上。即以文论，亦不在邵长蘅、尤侗之下。后之修《清史稿》者，竟不列入文苑传，失是非之准矣！”另外，他还指出陈玉璫为文留心日常生活，与当时其他士大夫不同：“况玉璫留心庶物，推究一名一物之源委。若是集卷七《农具记》、《宁古塔方言记》之类，比叙繁杂，考核详明，尤有裨实用，他家文集中所未有也。”^{[7]41-43}

陈玉璫的《学文堂集》曾广泛征求当时名家序言，正文前收录冯溥、吴伟业、王崇简、周亮工、卢紘、黄与坚、奚禄治、盛符升、陆阶、魏际瑞、姜宸英、周启、程世英、钱肃润、汪懋麟、魏禧、戚藩、越閿、何掇、李颙、吴颖、陈瑚、杜濬、张侗等24人的序，此外钱澄之、邵长蘅、李邕嗣、屈大均、陈僖、储方庆、张贞等，也都先后为《学文堂集》作序，散见于各人文集。序文作者多达三十余人，“亦自来别集中所罕见”^{[7]43}。张舜徽因此批评陈玉璫的集中序言太多：“虽云交游弥广，无非友朋颂扬之词，然而褒美已甚，不脱文士标榜之习，积牍连篇，转成是集之累矣！”^{[7]43}然而换个角度来看，为其作序的人中，数人文集或已不存，或难寻觅，后人借序可窥作序之人文学主张之一斑。另外众多序言并非全为溢美之词，这也为评价陈玉璫的文章和古文理论提供了众多参考意见，具有相当高的价值。

为陈玉璫作序的，既有达官贵人，也有落拓布衣；既有遗民，也有新贵。他们通过序文与陈玉璫

^①“宋格”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批评常用术语。如卷一百八十四评吕谦恒《青要集》时认为：“其诗纯作宋格，疎爽有余而亦颇伤朴直，如《洗象行》之类，皆病于太质。”卷一百七十三评陈维崧《陈检讨四六》：“（章）藻功刻意雕镂，纯为宋格，则三袁、鍾譚之流亚。”

商榷古文之道,相互切磋,形成了某种学术交流网络。艾尔曼研究清代江南学者学术交流机制时指出:“当时,各种信件文稿常为朋友传抄,甚至交给他人阅读、讨论。……许多学者借助这种方式可以得到学术界的中肯评价、认可和广泛注意。许多资深学者通过书信交换的方式,如梁启超所言,开始和需要解答疑难的学术新秀建立联系。”^[8]陈玉璣通过向大江南北文士广征序文,也具有类似的学术交流作用,我们不能单纯认为这是“文士标榜之习”而一笔抹杀。

在如何学习古文的问题上,陈玉璣和董以宁一样对“规摹左国史汉”和“规摹八家”者都表示了不满,明确提出要以六经为文章的基础:

“今日能文之士鲜不奉法唐宋大家,上者秦汉而止,不知昔人之所以得成其为秦汉大家者,莫不本于经。今人置经学不讲,第求之秦汉,第求之唐宋大家,宜乎不能为秦汉、为大家。……今人作文,莫病于摹拟,秦汉大家之前,未尝有秦汉大家,乃必规规然曰:‘我学秦汉,我学大家。’纵极肖,不过为古人奴隶,况不能肖乎!……人知无法之为病,不知有法之为病。惟能不囿于法,始可得古人之法,始可自成为我之法。”^[9]

“吾人立意,止于唐宋大家,势必不得为唐宋大家。惟以六经为寝庙,以左史为堂奥,以唐宋大家为门户,而后上者可至于左史,下不失为唐宋大家。”^{[10]385}

“窃叹今世善学古人之文者,多奉唐宋大家为准则的。不知大家之所以为大家者,非无本而然,或本周秦,或本两汉,其源流莫不可溯。昔人由周秦两汉,得成其为大家,今人第学唐宋大家,而不识周秦两汉为何书,大家岂遂能至?”^[11]

由此可知,陈玉璣不肯苟且随俗落入摹拟唐宋八大家的窠臼,而是上溯群经,力求“不囿于法”,“得古人之法,始可自成为我之法”。这也是“毗陵四家”一致的观点,如龚百药也认为,“吾党之文不传可不作,思所以传,必求端于经,盖经者道之聚也。……不然,舍经而求,即穷老尽气,思自立一意、创一格,以胜古人,必为古人所不取”^[12]。“毗陵四家”中董文友晚年志趣大变,“一概摈去,专事于穷经”^{[1]382}。陈玉璣经学造诣亦颇深,屈大均《学文堂集序》评论说:“陈子为文甚众,义本儒先,能于五经四书多所发明,而《易解》诸序尤为精醇,其殆得于圣人之文耶?”张舜

徽先生称赞陈氏经学造诣高深:“故其治经之功亦独勤……实事求是,信有发前人所未发者,抑亦好学深思之效也。”^{[7]42-43}

像董文友一样,陈玉璣也追求文章之“洁”:

“古人之裂取止于六经传记,今人则泛滥而莫可穷诘,甚至释氏之言亦得窜入,文体之败一至于此。求洁之道,既以此为大戒,而又从篇省句,从句省字,至排偶对仗之句,尤所痛绝,宁少毋多,宁以质胜而不以文胜。譬如五品之金,惟金为最贵,金之质清,质清则体重,文能质清而体重,而洁庶几矣。”^{[9]472}

“自古文章之难,莫过于洁。洁则气不浮,排偶之习必去。循首尾观之,所为畔越雷同之病必无有。柳子厚曰:‘本之太史,以著其洁。’是古之最洁者,莫若史迁,而苏明允讥其杂取六经传记及屈原、长卿骚赋之文,错于其间,似于洁犹有未尽。然试悉去其剽割而以所自为者反复之,洁固在也,虽然,总不若左丘明文为可贵。”^[13]

陈玉璣抨击当时文章中骈俪泛滥、充斥小说家言甚至夹杂释家之言的情况,主张通过落实到语言文字的“从篇省句,从句省字”的反对骈俪的举措来贯彻文章“洁”的追求。他以《史记》和《左传》作为“洁”的标准,尤以后者为学习榜样,强调学习经典“有本”的重要性。“毗陵四家”这种对于“洁”的癖好与追求,对后世桐城派“雅洁”观念的形成,具有启迪和先导的作用。

三、“毗陵四家”与《文统》编纂

“毗陵四家”为贯彻其古文理念,集体从事《文统》编纂,搜集当代符合其古文理论的文章。其中陈玉璣是发凡起例的核心人物。陈玉璣《文统序》说:“予自丁未为是选,迄今踰六七年,四方投赠之文不啻万计,又恐深山穷谷之中,其人身名不见于世者多致湮灭,广为探取,又得千百篇有奇。精而择之,共得若干篇。一文经数十繙阅,又质之程村、文友、琅霞诸子,求弗畔乎圣贤之道而后登之。”^[10]由此可知,陈玉璣编纂《文统》始于丁未(康熙六年,1667年)。这一年陈玉璣中进士,大概随后便开始了编纂《文统》的浩大工程。这一工程当然远非陈玉璣一人所能独成,于是他“又质之程村、文友、琅霞诸君子”,可见“毗陵四家”都曾先后参与《文统》编纂。这也可从魏禧《答友人论选〈文统〉书》中得到印证。魏禧信中

毫不客气地拒绝了友人请托：“又赐佳文，欲仆选入《文统》，意谓仆寓陈君所，必与选政，得率意出入，则甚不然。……辟作室者，规模既定，梁木、榱栋、榑桷既架，门材、瓴甃既具，丹堊既陈，而拙工顾欲以毁瓦画墁之能，参事其间，岂有是乎？”^{[14]282-283}康熙十年（1671年）秋冬，魏禧与其兄际瑞，曾住陈玉璠家数月，与他切磋古文，因此必然对《文统》编纂有所了解，文中所说的“是选经始于邹、董、龚、陈，收功于椒峰”应当是可信的，但“十九已为成书”可能为他拒绝的托词。《文统》编纂工作到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尚未告竣，详见下文。

“毗陵四家”均参与《文统》的编纂，自然都负有搜集文章之责，如前文魏禧所说，三魏文章最早由邹祗谟搜入《文统》中，“仆兄弟文，向为邹程村得之，遂与椒峰选《文统》中”^{[14]282}。储方庆《与邹程村论谢献庵〈题名记〉书》指出邹祗谟编《文统》不当收入谢良琦（号献庵）的文章：

“读尊选《皇清文统》，有谢献庵记敝邑县令题名一篇，愿表兄亟置之也。献庵以郡倅掇鄙邑篆半载，而贪风大作，其后卒以墨败，献庵自取之也。献庵不自责，顾疑敝邑有中之者，无所泄其愤，而寄之于《题名记》，以訾议敝邑之人。其言不信，不足取也。……献庵以不信之言欺天下，其言亦非矣，奈何录之哉？”^[15]

储方庆特意撰文，只因为谢良琦一篇不实的泄愤之文入选了《文统》，所以他反复叮嘱表兄邹祗谟应当弃置此文：“独惜《文统》一书，网罗天下著作，以成一代大文。……所以不能已于言者，为《文统》也。”可见时人对《文统》十分重视。邹祗谟为储氏表兄，也参与了《文统》编纂，因此储方庆借亲戚关系加以劝谕。文中提及“贵邑名公钜卿日夜校讐其中”，也可见当时“毗陵四家”夜以继日编纂《文统》的艰辛。

董文友、邹祗谟康熙八年（1669年）、康熙九年（1670年）相继去世后，陈玉璠与龚百药依然孜孜不倦地从事《文统》编纂。程世英说：“毗陵陈子椒峰，以高才工古文，乃取一时公卿大夫、韦布之士所为古文，与龚子琅霞选为《文统》以传，用彰国家同文之盛。……吾闻《文统》之选，远近邮寄者，文以亿万计，椒峰心目经营，遴而得之者盖数千。”^[16]

相映成趣的是，有人四处托关系找门路，千方

百计将文章塞入《文统》，也有人要求将自己的文章从《文统》中删除。如李长祥曾提到：“两先生不废弃无能，以仆之文，选入其中。……惟两先生教诲我成我，将所选仆之文删去，俾仆得以一意守拙，闾然斯世。况《文统》一代之书，以仆之糠粃，杂其中，自宜为精者之累，又在二公之洁此书也。”^{[17]257-258}李长祥拒绝自己的文章入选《文统》，其一是因为他与当世流行的文学主张，尤其是《文统》编纂者之一董文友的文学主张有矛盾：“初与虞山先生议论不合，近在锡山，请教太仓先生，复不甚合。文友公又连当世之文公左之。仆因思世之文，非仆之所谓文；仆之文，非世之所谓文，而孤陋执守，绝众人之见。”^{[17]258}而董文友的文学主张与“毗陵四家”其余三家观点基本一致。陈玉璠曾说：“昔尝与程村、文友、琅霞三子持是论，交相黜勉，十余年来限时考课，凡有著述，互为评驳，兢兢求合先圣贤之理道。”^[18]李长祥与董文友的文学主张有矛盾，意味着他与陈玉璠、龚百药的文学主张也不甚相合，于是不情愿入选《文统》，“与当世之文不合，徒滋人议论”。其二是因为《文统》有清朝官方支持的背景，所谓“今得当事之助，则泰山可高，沧海可大，旦夕之间，大贝天球，光烛天地”。而李长祥自称“予遗民也”，身为遗民，他反对自己文章被选入具有官方支持背景的选本中。另外，作为遗民，他显然反对魏裔介、陈玉璠等阐发的为维护新兴的清王朝统治服务的“道统”、“治统”、“文统”思想，更反对为清王朝所谓“文教之兴”歌功颂德。

李长祥说《文统》“得当事之助”是有来由的。当时朝廷重臣大学士魏裔介对编选古文选本具有极其浓厚的兴趣，编有《古文欣赏集》、《左国欣赏集》、《两汉欣赏集》等，还谋划整理唐、宋、元、明的诗文，但因公务繁忙，因此委托吴伟业、陈玉璠等从事此项工作。魏裔介在写给吴伟业的信中说：

“仆……顾于文章，尚未能忘情，近有虞明陈子、颂嘉曹子至京邸晤对，知其所学，皆以成立，而古文辞卓犖不群，追美古人无难。先生灵光岿峙，东南领袖，若与之左提右挈，尚论千古，著为定评，诚千载一时也。昔萧统《文选》于梁季，后代词人奉为枕中鸿宝。张先生天如所批《汉魏百名家》，至今称艺坛鼓吹。乃自唐宋以来，诸家著作，渐以零落散失。今既有三吴、两越诸子网罗分校，先生

综其成，岂不为文圃之盛事乎！又元、明以来亦有数十百家诗文，尚无定论，参伍进退，似亦在此时也。惟留意而商榷之，远追昭明，近绍天如。”^[19]

而吴伟业的反应，据陈玉璫《奉答魏相国书》记载，是这样的：“先生读书而喜，则以为所选文体求合于唐宋大家。西铭时文尚六朝，故所选多近六朝，今所尚非六朝，当不必取六朝。”^[20]⁴⁶⁴ 陈玉璫在信中详细汇报了他和吴梅村往复商定可入选《文统》的唐、宋、元、明诸家名单，认为“今前明人集幸而具在者，苟不急为刊布，将来散亡之忧，视昔为甚。此固后死者之责，璫敢不竭蹶以仰成阁下意”^[20]⁴⁶⁵，表达了编纂《文统》的坚定决心。以陈玉璫为核心的编纂《文统》群体，显然具有官方支持的背景，否则如此浩大的工程难以成功。

魏裔介作为清初理学重臣，面临当时政局、思想混乱的窘境，迫切想以程朱之道来束缚和统一一时人思想，巩固新兴的满清王朝并为之歌功颂德。这个意图，他在《〈观始〉诗集序》中说得很清楚：“会国家膺图受箓，文章彪炳，思与三代同风。一时名贤，润色鸿业，歌咏至化，繁维诗道，是赖于是。”他将“取诗以陈之”、“取诗以纪之”、“取诗以美之”^[21]⁶⁶⁰⁻⁶⁶¹。他希冀以诗文选本来束缚异端的思想，“若夫淫哇之响，侧艳之辞，哀怒怨诽之作，不入于大雅，皆吾集所弗载者也”，并以水之泛滥而冲决堤岸，告诫吴伟业要防微杜渐：

“子不见夫水乎，当其发源涓涓湿湿，其清也可凿，其柔也可玩。既而潢污行潦，无不受也，平皋广陆无不至也。及乎排岩下瀨，淫鬻浞泊于江湖之间，则奔突冲决之患已成，势且莫之制矣。吾为是选，宁使后之君子，有以加之踵事增荣，殆将竣焉。若兹者起尾闾，盼滥觞，岂可即决防溃闲，莫知束伏，而不早为之所乎？凡以慎吾始焉尔。”^[21]⁶⁶¹

康熙四年至八年（1665年至1669年），魏裔介连续编纂《圣学知统录》、《圣学知统翼录》两书，以官方理学权威的身份，确定了一个从尧舜、孔孟以下直到许（衡）、薛（瑄）的“道统”，还确定了一个“自董江都以下至高存之”^[22]的“翼圣之统”，两统之外，“功利杂霸、异端曲学之私，不敢一毫驳杂于其间”，最终目的无非是巩固清初统治之局面，即所谓“稍有助于化民成俗之意也”^[23]。有人谄媚其《圣学知统录》说：“是录出，而前千百年授守之统于此而定，后千百年教学之

统亦于此而定矣。”^[24]对于魏氏的这种举措，孔定芳认为：“明清易代，满洲贵族入主中原，统治合法性的论证更是尤显紧迫和必要。这是因为，在深受夷夏观念浸淫的汉人眼中，满洲统治者毕竟是‘非我族类’的‘夷虏’，其‘治统’的合法性自会受到质疑；而在作为汉文化代言人的明遗民看来，明清易代不仅意味着汉族‘治统’的丧失，而且象征着中华文化‘道统’面临中断之虞，这样，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文化上，明遗民都不承认清廷统治的合法性。面对这种信任危机，清初统治者一方面在政治上自造‘治统’，宣示其‘得统之正’；另一方面在文化上建构‘道统’，塑造其儒家‘道统传人’形象。”^[25]

康熙六年（1667年），陈玉璫中进士，在京师与魏裔介结识，受其巨大影响，并受嘱编纂《文统》，因此《文统》的编纂理念，实际上渗透着魏裔介的主张。《文统》与《圣学知统录》、《圣学知统翼录》等相为表里，以文章选本形式贯彻魏裔介的主张。陈玉璫在文中自问自答：

“客谓予曰：‘文何以统名？’予曰：‘我朝抚有区宇，至今皇帝缙承前烈而光大之，所云大一统非其时乎？予欲以国家所统之人文，犁然毕备，以为本朝之文教在是也。’昔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以道相传，称曰‘道统’，所传者道，而道赖以传者文，故曰：文者，载道之器，文与道固未可歧而二之。……我朝自开国来至今三十余年，文教之兴如是，道统与治统皆不外此而得之，则予之续是选以成书，又乌可量也哉！”^[10]³⁸⁵⁻³⁸⁶

陈玉璫明显是追随魏裔介“道统”、“翼圣之统”的思想，希望以编纂选本《文统》为文章之道确立一个一以贯之的“文统”，其最终目的无非是显示清朝“大一统”的繁荣，“以国家所统之人文，犁然毕备，以为本朝之文教在是也”，“文教之兴如是”，从而为清朝统治的合法性辩护。

康熙六年（1667年）七月，皇帝亲政，八月即命魏裔介祭祀孔子。康熙帝深受其周围尊孔崇儒的臣子影响，自幼便勤勉于儒学经典的学习，亲政后通过一系列政策，将儒家思想确立为统治的主导思想。康熙十六年（1677年），康熙帝在《日讲四书解义序》更明确表述儒家“道统”与清朝统治的“治统”密不可分：“朕惟天生圣贤，作君作师，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道统在是，治统亦在是矣。历代圣贤创业守成，莫不尊

崇表章，讲明斯道。”^[26]康熙帝将“治统”与“道统”合一，以提倡儒家学说为治国策略，为清初持续了数十年的文化纷争画上了句号，儒学从此获得明确的正统、合法的主导地位，这决定了清初社会政治和文学的演变方向，同时也为清朝社会稳定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因此，这个论断不仅对清代政治演进具有深远影响，同时对清代文学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康熙帝更通过一系列敕修文章选本，如《古文渊鉴》、《钦定四书文》、《唐宋文醇》等，不断强化他的“道统”、“治统”合一的思想。有研究认为这几部敕修文章选本“对于清代正统文学思想的形成和文风建设都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27]。值得注意的是，康熙六年（1667年）皇帝亲政，这是清代统治思想转变的重要契机，而陈玉璫等修纂《文统》恰恰肇始于这一年。《文统》是最早预示这一思想转变的文章选本，其言“我朝自开国来至今三十余年，文教之兴如是，道统与治统皆不外此而得之”实开康熙帝论断之先声。

然而，陈玉璫等编纂《文统》并非一帆风顺，首先是董以宁、邹祗谟相继去世，继而龚百药志趣转向佛道，“毗陵四家”中只剩陈玉璫独自坚持《文统》编纂——“十余年来，予与程村、文友、琅霞三子以振兴古学为任，朝夕切劘，尝合刻四子文质之当世。无何，邹、董相继死，琅霞稍涉二氏，吾道不无孤立之叹。”^[28]对此，好友何黎加以勉励：“余过毗陵，见四子各出所为文相讎校，其足传不减有宋诸家，且又生同邑，叹为极盛。未数载，程村、文友竟忽焉以歿，令人念之歔歔流涕。而琅霞先以邑人之灾，郁郁穷愁，近益求适意性命诸书，独椒峰意境勃发，斯文未丧，专赖振兴之力。此程村、文友相与重望于泉下，欲相附以传之无穷者也。”^{[16]357}此序虽本为勉励陈玉璫文章更上一层楼而发，但其中也有望其坚持《文统》编纂以不负亡友邹祗谟、董文友之期盼的意味。陈玉璫也果然没有辜负朋友所望，依然坚持《文统》的编纂。

与《文统》编纂过程的艰辛相比，刻费没有着落才是吴伟业、陈玉璫最为担心的。陈玉璫给魏裔介的信中说：“此书果能告成，有功前贤非小，然剞劂之费浩繁难办。梅村先生深以为虑。台札云：‘需好事者其成之。’未卜应属谁人？阁下主持文教以来，四方名公巨卿，蒸蒸好古，诚审择而命之，当亦无难。然其事亦不必专属一二人，视有

同心者，量其力所至，或刻一家二家，合少成多，较为易举。某人刻者，前即识其姓名，踊跃从事，当不乏人。”^{[20]464-465}陈玉璫信中建议魏裔介利用“主持文教”的太学士的显赫身份，寻觅“同心者”一起来刻印此书，乐观地认为“踊跃从事，当不乏人”。但康熙十年（1671年）冬，吴伟业病卒，陈玉璫失去了一位共商编纂之计的先辈。此前，他还遭受了更大的打击——康熙九年（1670年）魏裔介遭弹劾，深感仕途险恶，于第二年春天便上疏告病还乡。魏、吴相继离职或去世，世态炎凉，再无人愿为此书刊刻而“踊跃从事”，陈玉璫一生心血所系的《文统》最终未能刊刻成书，与此有莫大关系。这正应了李长祥的预言：“二公收之不胜收，所录既富，资费必艰，二公家居读书，清贫自守，必不能使其书之告成事也。”^{[17]257}

然而，《文统》是凝聚“毗陵四家”，特别是陈玉璫一生心血的文章选本，有文献资料可证，至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陈玉璫依然孜孜不倦于《文统》编选。陈玉璫回复范方时说：“如尊稿崇论宏议，美不胜收。此拙选《文统》中所亟欲借光者，但以日内敝郡志书，尚未卒业，未暇抄临。祈先生择其间最有闲乐文字，尽数录示，他日补入拙选，告竣之日，求正宗工也。”^[29]陈玉璫信中提及自己近日正忙于修撰“敝郡志书”，我们查证后得知陈氏曾修纂的《常州府志》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春开始动工，同年五月修完。而他信中说“日内敝郡志书，尚未卒业”，那么写这封信的时间当在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春至五月间。可见，直至康熙三十三年，《文统》编纂工作尚未见“告竣之日”。

“毗陵四家”所编《文统》一书选入的明末清初文章极多，编纂者又多加精心选择，使之契合清代统治思想和文学思想的转变，具有重要的文献和文学价值，但此书终未能刊刻，后世也不见钞本流传，实在可惜。然而，从“毗陵四家”编纂《文统》的情况，我们可以明了其与清初统治者“治统”、“道统”理论的互动与呼应，窥见清初江南学人文学思想变化之一斑，这也算弥补了一些缺憾吧。

参考文献：

- [1]陈玉璫. 董文友遗集序[M]//陈玉璫. 学文堂文集：第二卷.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382.

- [2] 邓之诚. 清诗纪事初编[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429.
- [3] 董以宁. 正谊堂文集[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97.
- [4] 邵长蘅. 陈椒峰史论序[M] // 邵长蘅. 邵子湘全集: 《青门麓稿》第四卷. 济南: 齐鲁书社, 1997:172.
- [5] 邵长蘅. 陈椒峰文集序[M] // 邵长蘅. 邵子湘全集: 《青门麓稿》第四卷. 济南: 齐鲁书社, 1997:745.
- [6] 纪昀.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1656.
- [7] 张舜徽. 清人文集别录[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3.
- [8] 艾尔曼. 从理学到朴学[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5:140.
- [9] 陈玉璠. 与张黄岳论文书[M] // 陈玉璠. 学文堂文集: 第九卷.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4:472.
- [10] 陈玉璠. 文统序[M] // 陈玉璠. 学文堂文集: 第二卷.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4:385.
- [11] 陈玉璠. 澹木斋文集序[M] // 陈玉璠. 学文堂文集: 第二卷.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4:382.
- [12] 陈玉璠. 龚琅霞文集序[M] // 陈玉璠. 学文堂文集: 第二卷.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4:381.
- [13] 陈玉璠. 魏冰叔文集序[M] // 陈玉璠. 学文堂文集: 第二卷.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4:381.
- [14] 魏禧. 魏叔子文集外篇: 第六卷[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3:282 - 283.
- [15] 储方庆. 储遯菴文集: 第一卷[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97:17.
- [16] 陈玉璠. 学文堂集序[M] // 陈玉璠. 学文堂文集.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4:355.
- [17] 李长祥. 与龚介眉、陈椒峰论文选本书[M] // 李长祥. 天问阁文集: 第三卷.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97.
- [18] 陈玉璠. 远志斋遗集序[M] // 陈玉璠. 学文堂文集: 第二卷.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4:386.
- [19] 魏裔介. 与吴梅村书[M] // 魏裔介. 兼济堂文集.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230 - 231.
- [20] 陈玉璠. 奉答魏相国书[M] // 陈玉璠. 学文堂文集: 第九卷.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4:464 - 465.
- [21] 吴伟业. 《观始》诗集序[M] // 吴伟业. 吴梅村全集.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 [22] 魏裔介. 圣学知统翼录序[M] // 魏裔介. 兼济堂文集: 第三卷.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70.
- [23] 魏裔介. 圣学知统录序[M] // 魏裔介. 兼济堂文集: 第三卷.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69.
- [24] 魏荔彤. 魏贞庵先生年谱[M] // 魏裔介. 兼济堂文集: 第二十卷.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608.
- [25] 孔定芳. 清初朝廷与明遗民“治统”与“道统”合法性的较量[J]. 江苏社会科学, 2009(2):189 - 197.
- [26] 康熙. 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 第十九卷[M].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185.
- [27] 孟伟. 清代敕修文章选本及其对文风建设的意义[J]. 社会科学家, 2005(6):28 - 31.
- [28] 陈玉璠. 青门集序[M] // 陈玉璠. 学文堂文集: 第二卷.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4:384.
- [29] 范方. 《上陈椒峰书》后《附陈答书》[M] // 范方. 默镜居文集: 第三卷.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97:672.

(责任编辑: 黄燕 许成安)

“Four Poetry Masters of Piling” and the Compilation of *Wen Tong*

CHEN Sheng-yu

Abstract: “Four Poetry Masters of Piling” is a famous literary group in early Qing Dynasty.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Dong Yi-ning and Chen Yu-ji’s points of view on the classical proses. It is engaged in efforts to discuss the compilation of *Wen Tong*. The book obtains Wei Yi-jie’s support and implements his concept of confucian orthodoxy, and also reflects Emperor Kang Xi’ opinions on confucian orthodoxy and governing.

Key words: Four Poetry Masters of Piling; Wei Yi-jie; *Wen Tong*; the compilation of the selected